



党史文化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

(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2014年9月 中国·贵州



党史文化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

(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2014年9月 中国·贵州

目 录

南靖抗日救亡宣传的党史文化特征·····	蔡建南（1）
抗战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论析·····	曹子洋（10）
中共七大文化思想的多维观照·····	陈答才 张 丽（22）
中共抗日战争纪念的历史演进·····	陈金龙（32）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宣传思想中的群众观·····	陈丽红（42）
中国共产党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活动·····	丁卫平 郑肖辰（51）
传承抗战历史文化 增进台胞国家认同·····	方永乐 方 宇 于昌华（6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海军军事文化创新发展与启示·····	房功利 江新国（70）
党史文化研究的“新文化史”视角·····	郭若平（75）
革命符号与政治象征：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纪念空间研究·····	胡国胜（85）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研究的意义·····	黄延敏（96）
从陇东红色歌谣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党史文化·····	李荣珍（105）
邓小平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文化工作·····	李 蓉（113）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的演进·····	林 坚（123）
八路军影像文化事业概要述评·····	刘中刚（133）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东南进步文化活动·····	毛立红（145）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抗战时期党的文化队伍建设·····	聂红琴（154）
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的文化教育工作·····	牛保良（162）
《新民主主义论》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传播及其反响·····	裴 植（168）
法租界广州湾的抗战文化·····	屈康慧（181）
论新四军文化建设工作·····	石 雷（187）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研究·····	宋永永 付会财 马建波（196）
试述中共抗战思想影响下的台湾义勇队抗日文化工作·····	孙 瑛（205）
弘扬党史文化传统 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汤家庆（213）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形态对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推动·····	王 刚（218）
试论抗战中党对山西文化建设的重视·····	王家进（22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王素莉（237）
湖南抗战文化的繁荣及其启示·····	王文珍 朱柏林（241）

延安整风与党内的思想教育运动·····	王英敏（250）
关于党史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吴桂韩（260）
抗战时期中共政党文化社会化的教育路径·····	武加福（269）
新疆抗战文化的形成、传播及其历史贡献·····	向干国（277）
抗战时期冀鲁豫边区整风学习运动述论·····	向 伟（286）
重大题材影视创作与党史文化普及·····	夏远生（296）
湖南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萧栋梁（306）
手笔如刀：《抗战》三日刊在抗战初期的民众动员·····	谢卫 吴仁明 廖乾翔（317）
纪念红色节日与党史文化的传承·····	许晓敏 王全有（327）
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考察·····	杨凤城（334）
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运动再研究——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姚宏志（345）
略论中共广东党组织引领下的广东抗战文化运动·····	游慧冰（358）
对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小学教育的历史考察·····	张 辉（368）
中国共产党与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厦门分会·····	朱新屋（378）

南靖抗日救亡宣传的党史文化特征

蔡建南

南靖地处闽南、闽西的结合部，是连接闽粤赣三省交通线——漳（州）龙（岩）公路的主要通道。抗日战争时期，南靖的抗日救亡烽火接受厦门、漳州等闽南沿海城市的辐射，不断兴起，一浪高过一浪，并发展至周边闽南几县及闽西山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是波澜壮阔的福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具有明显的党史文化特征。

一、南靖抗日救亡宣传持续 14 年抗战

中国抗日战争是 8 年还是 14 年，在学界引起争辩。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①但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以七七事变为起点，抗日战争史研究可从九一八事变起，两者不存在矛盾。

南靖的抗日救亡宣传以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为起点，以芗潮剧社的领导为推进，以龙溪师范和厦青团活动为呼应，以厦门大同中学宣传为依托，持续 14 年，直到取得抗战胜利才结束。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纷纷举行罢工、罢课，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和示威游行，反对不抵抗政策。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工人、农民、学生积极支援国民党 19 路军抵抗日本侵略军，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积极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政策。各地人民还组织“抗日救国会”等团体，募捐支援抗日军队和开展抵制日货等。上海文治大学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曾在南京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任教的高岗山，辞去漳州龙溪中学教师后，于家乡南靖县武林积极宣传抗日。

1932 年 4 月，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支持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一、五军团从江西挥师东征福建。4 月 10 日，东路军攻打龙岩取得胜利，迅即直下南靖、漳州。4 月 15 日，毛泽东进入南靖境内，当天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34 页。

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①全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

红军东路军无论攻漳前驻扎南靖，还是攻克漳州后分兵南靖，在 50 多天时间内做了大量宣传，其中包括抗日宣传。1982 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 50 周年进行红军标语普查，仅存的上百幅墙标就有许多抗日内容。如“打倒矮寇”、“反对日本出兵东三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红军的抗日宣传，给南靖人民很大影响。出身于“书香之家”的高中毕业生胡大机，是漳南汽车公司南靖站售票员，以工人代表身份，与红军联系，见到了罗荣桓、毛泽民同志。他接受组织红色汽车工会的任务，担任工会主席，同时参加红军政治部活动，导演话剧，公开演出，还参与组织工人赴中央苏区参观。高岗山从龙岩返回南靖，为红军做向导，当翻译，用闽南方言编成《农民歌》、《十劝妹》等红军歌谣，建立武林农民赤卫队。红军回师中央苏区后，胡大机暂时避往厦门，高岗山继续在南靖开展抗日和革命宣传。

1934 年春，漳州一部分爱国进步青年发起创立以研究文学创作为主的“虹桥文学戏剧社”，不久转为以研究戏剧为主的“芗潮剧社”。芗潮剧社领导人胡大机、蔡大燮、柯联魁、许铁如（彭冲）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为了推进漳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柯联魁于 1935 年春到南靖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柯联魁的爱国热情与才华得到南靖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王元的赏识，将柯聘为馆员。柯联魁以民众馆为阵地，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很快组织起一支进步群众团体——南靖民众剧团。1935 年 10 月 10 日，芗潮剧社第一次到南靖，与民众剧团同台串演《母亲》和《逃》两出剧目，观众 3000 多人。王元在半月刊《南靖民众》创刊号上，以大量篇幅对剧目、剧情作了详尽介绍。

民众馆还组织儿童团，举办“小额贷款”（无利息贷给贫民），创设“民众讲座”，高岗山经常在“民众讲座”上主讲时事。

1936 年 10 月 9 日，鲁迅逝世的噩耗传来，柯联魁暗中策划南靖各界进步人士开展追悼活动，而且民众馆报纸《南声旬报》还刊出“哀悼专号”。

1937 年 2 月，柯联魁按照党组织的意图，安排中共党员、芗潮剧社社员黄浪舟到南靖山城小学任教，开展抗日宣传。4 月，黄浪舟与中共党员郭若萍、郭章穆、林子青等紧密团结，以山城小学师生为主体，组织起一支抗日救亡宣传队。

4 月 25 日，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南靖县科岭下斜村紧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谢育才、温仰春、魏金水等参加会议，制订《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闽西南人民抗日救国纲领》，设计了闽西南地区实现联合抗日的蓝图，是闽西南的斗争由“抗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71 页。

日反蒋”走上“联蒋抗日”的重大转折。

7月，黄浪舟根据柯联魁指示，组织成立山城民众抗日救国服务团，首先争取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国民党山城区党部执委孙天恩任副团长，再动员山城地方实力派张河山任团长，黄浪舟任秘书，郭章穆、林子青负责宣传组。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继福建省抗敌后援会的成立，国民党南靖当局也于7月30日成立“抗敌后援会南靖分会”，由南靖县党部指导员庄达衡任主任，王元任秘书。9月，按照国民党南靖县党部的通知，山城服务团改为“南靖县抗敌后援会山城分会”，黄浪舟担任总干事。10月，庄达衡辞去主任之职，抗敌后援会南靖分会工作实际由王元负责，王元又组织抗敌宣传队、抗敌剧团、抗敌歌咏团，公演话剧，编印“日寇暴行图”，唤起民众对日寇的仇恨。

1937年下半年，龙溪师范学校从漳州迁入南靖县和溪，大张旗鼓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年上半年，厦门集美中学一个民教队到南靖县和溪搞民教，龙溪师范抽调部分学生与之合作，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1938年5月底，厦门沦陷后，中共厦门工委及其领导的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简称厦青团）等抗日团体转移到漳州，其中厦青团第二分队共15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在队长童丹汀、副队长洪椰子率领下，在南靖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年6月4日，柯联魁从南靖返回漳州时，在王元家住宿商谈抗日宣传事宜。第二天夜11时，柯联魁、高岗山、《闽南新报》副社长柯鸾声和韩进修4人在漳州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

1938年中秋节后，又一支厦青团工作队在副团长谢忆仁、工作队队长黄楚云率领下，到南靖山城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下半年，龙溪师范迁到南靖山城，师生与抗敌后援会南靖分会人员汇合一起，掀起抗日救亡宣传的热潮。

1939年春开始，国民党南靖县党部书记长兼任抗敌后援会南靖分会主任委员，分会实际工作则由王元和民众馆馆员黄奕赫负责。分会抗日宣传搞得轰轰烈烈，受到福建省抗敌后援会的一再传命嘉奖，直至1940年10月撤销分会。

1939年秋，龙溪师范从南靖迁往建宁县。1940年春，厦门大同中学从海澄县内迁南靖山城，师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利用课余时间大力开展抗日宣传。

1940年秋，龙溪师范复迁回南靖山城，改名为南靖师范。南靖师范与厦门大同中学共同在南靖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坚持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1946年3月，厦门大同中学帮助南靖创办县立中学后，迁回厦门。1946年秋，南靖师

范也迁回漳州，恢复原名“龙溪师范”。因此，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南靖县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从未停止过，实为罕见。

二、南靖的抗日救亡宣传广泛而深入

南靖的抗日救亡宣传广泛生动，形式丰富多彩，内容通俗易懂。演话剧，写标语，绘漫画，编歌谣，读书报，讲时事，唱救亡歌，游行等，开展得有声有色，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在山城，柯联魁和中共山城支部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抗日宣传活动。主要有：

1、创办南靖抗敌剧团。柯联魁兼剧团团长、编剧、导演于一身，黄浪舟任副团长，山城中心小学和民校教师为基本演员，先后公演《女人》、《可怜的裴伽》、《汉奸的子孙》、《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揭露日寇凶残和汉奸无耻的面目，还经常组织剧团成员化装上街宣传。

2、组织歌咏队。以学校师生为骨干，上街演唱和教唱柯联魁的《打杀汉奸》、《统一战线》等抗日救亡歌曲；编写《亲姐妹》、《安心过日子》、《好兄弟》等抗敌故事歌和救国公债歌，翻印《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到东北去》等各种抗日救亡歌曲 30 多首。

3、翻印宣传材料。先后编印《汪精卫诬陷官兵的罪恶》、《新中国的诞生》等小册子和三幕话剧《中国万岁》以及《日本倭寇怎样杀我们》漫画集，每天或 3 天刊印一版《时事简报》。

4、组织宣传工作队。仅几个月时间，抗敌后援会山城支会就拥有 7 个宣传工作队，60 名队员。这些宣传队一面制订宣传人员工作须知和下乡纲要，一面培训宣传骨干，以山城中心小学为主要阵地，定期集合队员，结合实际，注重实效地研讨工作方式方法，帮助和指导队员提高工作能力和艺术技能。队员们每天晚上都自觉地汇集一起，采用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例如上街演出小型话剧，教唱抗日歌曲，报告时事和前方战况。宣传工作队还经常绘制抗敌标语、漫画，挂贴在各乡村交通要道。

5、开展募捐、慰劳活动。抗敌后援会山城支会组织募捐队 3 个、队员 26 人，慰劳分队 1 个、队员 18 人，广泛开展募捐、慰劳活动。

1937 年 5 月 15 日，闽西南军政委发出《三致粤军公函》和《致闽西南各界人士书》，具体提出同粤军合作抗日的五项条件和四项保证。南靖各边界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积极采取行动，迅速展开一个声势浩大的争取和平运动，把闽西南军政委发布的文件、指示散发给各群众团体、报社、学校及商业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宣传人员油印大量标语、口号、传单，在农村、街道到处张贴，利用群众赶圩的机会举行集会。同时对粤军官兵及壮丁队、保甲长也发出大量公开信件，表明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抗日合作的诚意，并在具

体行动上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取得对方的信任。

七七事变后，高岗山先在漳州任《大刀报》总编辑，后参加芗潮剧社。高岗山经常与柯联魁等人一起交流思想，探讨国事，共商抗日大计。他多次回南靖，参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9月，南靖山城民众抗日救国服务团“不失时机地在山城小学广场召开有1000多人参加的纪念‘九一八’群众大会，邀请地方士绅名流登台合作抗日演讲。会后组织群众游行，高喊口号，散发传单。10月底，日寇侵犯金门后，山城服务团及时组织店员、师生，居民和各界爱国人士1000多人，举行火炬示威游行。群众高举火炬，齐呼口号，抗议日寇的侵略罪行。服务团还在人口稠密的大庙口设立固定宣讲台，每晚以歌咏队嘹亮的歌声吸引群众集会，让群众自动上台宣讲，历诉日寇侵华罪行。通过这些活动，抒发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热忱。南靖城乡抗日救亡运动与游击根据地的抗日反蒋斗争遥相呼应，逐渐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①

柯联魁和中共山城支部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政策，注意采用灵活多变的革命策略与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仅完全掌握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领导权，而且联合山城地区的进步群众团体及爱国开明人士，利用国耻大会、老人抗敌宣传会、春假下乡宣传会、全面抗战纪念宣传大会、精神总动员宣传大会等，开展抗日宣传和募捐慰劳活动，使山城成为南靖抗日救亡重要阵地。抗敌后援会山城支会团结一批有爱国正义感的教师和社会青年，经常组织他们学习时事，练唱抗日歌曲，利用圩日，选择群众集中的大庙口、水阁仔埕、中山纪念堂等地进行宣传，同时组织巡回队，下乡宣传抗日形势，揭露日寇的野心和残暴行为，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负责抗敌后援会南靖分会工作的王元、黄奕赫，团结许多有爱国热情的知识青年，共同搞好抗日宣传。抗日戏剧《阿根参军》、《蒋宝琛参军》、《送寒衣》等不断公演，抗日歌曲《国民精神总动员》、《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等传遍各个角落，“不分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全面抗战”等宣传品大量印发，广大民众抗日救亡情绪激昂。

1940年，南靖抗敌后援分会和山城支会先后上演《凤凰城》、《第二号汉奸》、《醉哈蟆》、《再会吧南洋》等大型话剧。话剧阵容庞大，布景新颖，每场演出虽长达三四个小时，但观众蜂拥而至，赞不绝口。

龙溪师范师生的抗日宣传活动生动活泼，歌咏、墙报、漫画、标语是最主要的宣传方式。每逢农历一、六和溪赶集日，各班同学轮流到圩场作抗日宣传，或教群众唱歌，或搭戏台召开“抗日救亡大会”，或公演《芦沟晓月》、《骂汉奸》等话剧。每星期六，同学们组成小分队，分头到邻近村庄唱歌、演讲，表演话剧、舞蹈等节目，甚至不辞辛苦徒步到几十公里外

^①中共南靖县委党史研究室：《南靖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的漳平巡回演出。黄典诚老师带 10 多人先后到偏远乡村宣传，受到群众的好评。当 1 名学生饰演汉奸游街示众时，群众听了痛斥汉奸的罪状，个个义愤填膺，竟忘记是在演戏，起哄要打他，幸亏其他同学及时解释，才未惹出麻烦。

厦青团第二工作队刚到南靖靖城，正遇上一队民工在公路上开沟挖壕，破坏公路，作阻碍日寇进犯的准备，大多数队员便加入劳动，少数队员在街头贴墙报，演话剧，吸引很多群众主动加入挖掘公路的行列。接着，工作队在靖城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抗日救亡演讲会，宣讲厦门抗敌斗争的情况，使群众对面临形势和为什么要抗日救亡，如何保卫家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

工作队到金山，演讲、读报、唱歌、念民谣都用闽南话，金山群众纷纷拍手称好，宣传工作富有成效。在和溪，工作队员与当地小学青年教师打成一片，一起搞宣传。圩日时，大家分成若干小分队，用门板搭成几个小戏台，在街头同台演出，既达到厦青团部提出的“点火加油”要求，又推动了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溪是国民党汀漳师管区营部驻地，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工作队还往营部驻地进行专场演出，受到驻军官兵的称赞。

工作队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宣传工作做到哪里。他们在街头宣传，演唱歌曲，往往悲愤交加，泪花伴随着歌声，令群众十分感动。他们不拘宣传形式，常深入街头巷尾给成年人读报、讲形势，或者召集少年儿童，用方言教童谣：“滚，滚，滚！大家都来打日本！大哥当先锋，小弟做后盾，打得日本鬼子变成番薯粉！”他们时而在街口、路边墙壁的醒目位置刷写“武装保卫闽南”、“军民合作，保卫福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大标语，时而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说，热情地深入到红军家属中慰问谈心，深受群众的好评。

工作队还深入龙岩宣传，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和斗志。他们从南靖到龙岩，往返近 200 公里，全靠两条脚走路。翻山越岭，路途艰辛，常以唱歌解疲劳，以山泉解饥渴，借小庙安歇，卧稻草泥地，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出色地完成宣传任务。

厦门大同中学聘请进步教师任教，师生利用课余时间繁华地带书写抗日标语，在集市唱抗日歌曲，在广场演出抗战话剧《悔罪男》和《有钱出钱》，在中山纪念堂演出抗日三幕剧《红心草》，取得很好效果。还出版“救亡壁报”，张贴于山城中心小学对面墙上，内容有“新闻报道”、“战地动态”、“时事述评”和漫画等，两周出一期，吸引大批民众驻足观看。此外，大同中学师生利用假期到附近乡村巡回演出皮影戏《抗日英雄小白龙》，齐唱《开路先锋》、《大路歌》等歌曲进行抗日宣传，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称赞。

南靖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席卷闽南、闽西大地，“人人讲抗日，家家议救国，时时闻歌声，日日救国忙”成为生动的写照。

三、南靖抗日救亡宣传的影响和意义

南靖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1、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党的统战政策不仅深入工农群众、开明人士、驻军官兵、爱国华侨等，而且把统战工作做到独霸一方的山城土皇帝张河山身上。龙溪师范在和溪期间，高举“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的旗帜，也赢得南靖富翁郑高九后裔和曾任国民党南靖县长、龙岩、永定、华安、平和、南靖五县民团办事处主任林价人及联保主任郑锦华的支持，还得到当时国民党驻军的配合协助。

2、以实际行动支持祖国抗战，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抗日救亡宣传运动中，南靖人民克服困难，节衣缩食，坚定不移地支持前线，除了用歌声、演讲、演戏、撰写文章、刷写墙标、印发宣传材料等鼓舞斗志外，还向社会各阶层劝募捐助，发动小学生举行储金竞赛，动员妇女赶制衣鞋，及时送去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厦门沦陷和 1939 年 6 月 21 日广东潮汕沦陷后，都有一批批难民逃往内地途经南靖，慰劳分队先后设立难民接待站，热情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困难，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尽管闽西南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种种反共摩擦事件，但南靖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是闽西南抗日救亡运动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斗力量，成为南靖人民自觉的革命行动，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前赴后继，进行英勇卓绝的斗争。当时和溪的龙溪师范青年学生陈德矩、沈耀昆、王恭娘、袁文德 4 人毅然放下书本，走出课堂，北上参加“抗大”和新四军，奔赴抗日疆场，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在抗日战争中，南靖籍阵亡的将士已知的有 105 名（按姓氏笔划排列）：王天权、王水泽、王两兼、王和尚、卢三省……”^①

“1938 年 2 月 27 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在白土整编。由和溪、科岭、版寮等地参加红军游击队的南靖子弟被编入第三团，由程溪、靖城等地参加红军游击队的南靖子弟被编入第四团……3 月 1 日，南靖人民的优秀儿女终于实现了开赴抗日前线的夙愿。他们随同二支队全体将士，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领下，从龙岩白土整装出发，离开家乡，浩浩荡荡开赴苏皖抗日前线。”^②

“南靖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鼓舞着海外的南靖侨胞也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特别是连任两届“南侨总会”副主席的庄西言和侨生张君武回国参战最为典型。”^③

“为抗日战争竭尽全力的南靖籍华侨还有印尼的张庆重。他团结华侨积极投入抗日救亡

^①南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靖县志》，方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90 页。

^②中共南靖县委党史研究室：《南靖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7 页。

^③中共南靖县委党史研究室：《南靖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4 页。

运动，并通过在香港的廖承志，多次捐资赞助祖国抗日军民，支持抗日……1940年，祖籍南靖县书洋的肖佛成领导泰国华侨开展抵制日货爱国运动，并捐款慰问抗日战争死难者家属。南靖县籍旅缅青年张汉青，参加中国赴东南亚远征军，在中缅边境抗击日寇。南靖县籍的新加坡侨生张庆璋回国就读武汉大学，自愿参加同盟军当翻译，转战于中印边界战场，英勇抗日杀敌，表现出舍身抗日的决心。”^①

3、柯联魁的惨死，是中华民族莫大的损失。

厦门沦陷后，漳州成了国防前线。柯联魁根据中共党组织交给的特殊任务，在南靖靖城、天宝一带组织群众，以便在日军继续进犯时开展游击战争。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一贯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十分惧怕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情，伺机扼杀抗日救亡运动，当柯联魁回漳州参与组织“漳州战时青年服务团”，准备协助驻军作战时，不幸惨遭杀害。

南靖是柯联魁谱写抗日救亡篇章的地方，柯联魁为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勇献身，在福建人民抗战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杰出的抗日救亡志士、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邹韬奋，对中共党员、优秀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漳州芗潮剧社主要领导人柯联魁被敌特暗杀，悲愤填膺。1938年8月28日，邹韬奋在他主编的《全民抗战》刊物写下这样一段内容：“为人类正义而努力，为国家民族而奋斗，志士的热血始终不会白流的，一部民族解放史就是要用许多志士的热血写成的。”他还在《一个救国志士的惨死》一文的按语中说：“联魁先生的惨死，是中华民族莫大的损失，我们不能让这样黑暗的情形长此下去。”

4、为避免日军飞机轰炸，南靖县城迁移，在全国绝无仅有。

抗战初期，南靖的抗日救亡运动主要在县城靖城，县城搬迁山城后，主要活动地也转移到山城。抗战时期，为避免日军飞机轰炸，南靖县城迁移，这在全国可以说绝无仅有。日军攻陷厦门后，为“使厦岛成为海军根据地，与台湾军港互为犄角，以抵制英国在香港，美国在菲岛及各国在鼓浪屿海军势力”^②，同时为配合其华南军事攻势，以切断国际补给线，于是对福建沿海各地加紧封锁和骚扰。漳州市区曾遭受数次轰炸，损失惨重。

距漳州仅10多公里的南靖县城，为避免日机轰炸，“民国27年7月，县长高恺鉴于靖城紧连漳州平原，易受日本侵略军飞机骚扰，遂又把县治西迁山城至今。”^③

果然，靖城没能逃脱日机袭扰的命运。1939年5月7日上午，8架日军飞机轰炸靖城。此次日机轰炸“共投炸弹18枚，机枪子弹无法计算，总计炸死28人，炸伤34人，炸毁民房30余间、公房20余间，炸死牲畜无数，操场、堤岸、渠道等5处被炸成大窟窿，日本帝

^①中共南靖县委党史研究室：《南靖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②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闽南地方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③南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靖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国主义对南靖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①

“1940年4月26日，4架日机再次轰炸靖城，投下两枚大炸弹，一枚炸倒城隍庙前王红家的房屋6间，弹片劈下‘坊表’柱石一大角，另一枚落在堤岸的大堀中，又一次犯下残暴的罪行，激起南靖人民的极大愤慨。”^{②③}

5、陈嘉庚视察南靖，对南靖抗日救亡宣传给予充分肯定。

1940年3月，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艰苦抗战的忠勇将士，视察各战区。在长达8个多月的视察中，他前后经历15省，其中在福建省视察最深入，时间最长，约2个多月。

在闽视察期间，陈嘉庚不忍坐视国民党福建当局祸国殃民，亲自为民请命，呼吁福建省主席陈仪改革弊政，还一连几次致电蒋介石要求改革闽政。由于陈仪对陈嘉庚的指责很反感，福建省府特电告南靖县长“不必组织欢迎，以免铺张浪费。”11月6日，陈嘉庚一行抵达南靖，质问县长“柴料何故近来价升数倍”，县长以“机关统运”、“运转迟滞”应答。陈嘉庚非常气愤，决意往省会永安向陈仪直谏。

第二天，南靖20多名厦门大学、集美师范学校的校友在县城中山纪念堂组织召开欢迎会，除县长和个别政府官员未便参加外，仍有国民党政府机关、各界人士和山城中心小学及厦门大同中学师生等上千人到会。陈嘉庚与秘书李铁民、重庆国民外交协会常委侯西反等在主席台就座。据林良材《陈嘉庚先生视察靖邑》记述，陈嘉庚在欢迎会上讲话，先自我介绍：“这次我们组织了华侨回国视察慰劳团，正团长是我，副团长是庄西言先生。庄先生因事先回南洋，而南靖是庄先生的故乡，又是我往永安必经之道，所以顺途到南靖来看看。”^④

陈嘉庚概述日本侵略军企图吞并中国独霸世界的野心，号召同胞们行动起来，为拯救中华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作最大的努力。他对南靖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充分肯定，“感到心慰”，但听说国民党南靖县党部对抗敌后援会横加指责，致南靖抗日救亡运动一度处于低潮，极为不满，便一针见血地提出批评，“我到永安要讲，到重庆还要讲”。

（作者单位：中共南靖县委党史研究室）

^①中共南靖县委党史研究室：《南靖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②中共南靖县委党史研究室：《南靖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③南靖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靖文史资料》第9集，1988年5月编，第33页。

抗战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论析

曹子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工作，始终把知识分子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依靠力量，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因此，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执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使当时的延安被赋予具有革命激情的极具感召力与凝聚力的“太阳城”，成为无数有志青年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向往的圣地和摇篮，为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重温抗日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于深刻理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新时期，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抗战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思与调整

“知识分子”的概念源于西方，原意是指以那些以独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公共关怀，体现出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应该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知识分子”一词在20世纪20年代才在中国为人所熟知。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十分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特点、作用等作了初步的探索，形成了基本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贯彻“发动工人运动，壮大工人力量”的革命路线，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自身的弱点，但出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上突出强调知识分子的积极面，在政策上以团结和争取为主。

大革命的失败，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出现偏差。当时党内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为：党内机会主义者的领导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而知识分子的广泛加入又是机会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在这一结论之下，党内对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动摇性及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批判开始升级，从而直接影响到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于是，党内出现了一股“领导机关工人化”即无产阶级化的极端错误倾向，尤其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最为激烈，他们把广大知识分子排斥在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外，把知识分子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之一而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一举措，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此错误作法，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虽然对打击、

排斥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批评和纠正，但这一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未有根本性的转变，总体上仍不乐观。

随着中共中央转移到陕北，毛泽东开始总结自建党以来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反思以往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反投降提纲》中指出：“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①1942年5月，毛泽东在《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的讲话中又提到：“那个时候，我们根据地与广大的知识分子隔绝了，与中心城市的人隔绝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又犯过错误，轻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好多用处，要是不犯这些错误，情况也许会好一些。”^②对过去对知识分子采取的关门主义错误深感痛惜。

抗战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抗战、革命中的作用，并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这种作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文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③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知识分子也是革命的动力之一，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④。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概括得更为精辟，认为“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⑤。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当时党内外存在的恐惧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现象。他指出：“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为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3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2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1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4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47页。

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拚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①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重要性的一系列阐述，既来源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又指导着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的丰富和发展，把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正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以往知识分子政策的深刻反思，同时结合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向中日民族矛盾转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最大使命的现实，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团结和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不仅有力地纠正了土地革命时期“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抗日根据地内一度出现的歧视与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而且创造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养人才的良好环境和风气，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呈现出一种新的、健康的发展趋势。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与实践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准确分析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特点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其加入革命队伍

党能否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是能否正确分析判断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特点。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②。对于知识分子的特点，毛泽东分析指出，“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的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③。正是对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入分析和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特点正确界定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全面论述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并具体提出了应该从以下4个方面去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18—6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4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41—642页。

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的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炼，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

（2）在这种大量吸收政策之下，毫无疑义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这类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者，则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但不要因此而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3）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4）对于一部分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则应该切实地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①毛泽东还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宝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②因此，我们党“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③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其对革命态度的正确论述，为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39年12月6日《军委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要求，根据中央12月1日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各部队及各政治机关就地尽一切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军队^④。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中规定：“非党员的专门人才要求入党时，我们应乐于吸收他们入党，对他们作苛刻的限制是不适宜的。”^⑤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校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19—62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4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68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3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5页。